



浙江宁波市天一学堂国学馆组织举行开笔礼（网络图片）



于魁智表演京剧（网络图片）

泱泱中华 文明博大

田蒿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魂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生产中积淀形成的精神财富，是凝聚民族认同的“共同记忆”，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根脉和灵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魂。”

“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魂”这一命题，在本质上表达的是对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深层次关切。作为悠久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当代继承者，中国人要能够清晰而自信地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这样的问题，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处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层面确认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作为百年近代中国苦难和悲情的亲历者，中国人要从遭遇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之后的文化失落、价值真空、意义危机中重建文化秩序，通过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

重塑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作为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步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人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中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当代中国人要完成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就要回到文明源头，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魂”中寻找精神力量和思想支撑，从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开出现代文化的新境界。

那么，何谓“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魂”？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来看，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公元前3000年左右，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开始形成；公元前2070年左右，第一个世袭制的统一政权夏朝建立；公元前17世纪，甲骨文已经出现。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有着较严密系统的成熟文字。甲骨文的记载，明确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迄今已有3700多年。正是因为有了文字系统的成熟和

广泛使用，才使得中华文明的历史谱系得以追溯，也使得中华民族从文明源头处逐渐积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得以代代相传。公元前3000至1000年间，中华文明的根脉得以确立并日益繁盛，中华文明在不断的成长进步中积蓄着实现超越和突破的巨大能量。

公元前1000年左右，《诗经》中最古老的部分——《周颂》和《大雅》已经产生。《诗经》产生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定型的时代，不仅文学形式从此定型，而且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从此定型。公元前600至300年间，中华文化迎来了自己的“轴心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易》《诗》《书》《礼》《春秋》《老子》《庄子》等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典籍都在这个时期出现。这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奠基时代，这个时代的先哲们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这个时代的著作成为后世代代相传的经典，中华文明的思想版图由此形成并延续至今。这些构成中华文化基本框架和特质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基本典籍，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魂”。

“穷变通久”的过程中实现的。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这种理性务实的发展观是支撑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

正是在这些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成长模式：“以我为主，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推陈出新”。所谓“以我为主”，就是要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古人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这个“宗”和“元”，强调的正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怎样向别人学习，中华文化立场不可放弃，民族本位立场必须坚持。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我们敞开胸怀，以兼容并包的态度积极学习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对于异质文明，我们在承认文明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找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和而不同”。在不同文明的相互碰撞、对话、交流中，中华文化实现了自我成长、自我更新，是所谓“推陈出新”。

“以我为主，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推陈出新”的成长模式造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灿烂、历久弥新，也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永续发展，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结合起来。”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吸纳历史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提升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所独创的文化精神，离不开对民族传统和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离不开历史智慧的滋养。当前，丰富而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正在新时代背景下获得复苏，正在成为文化发展的巨大源泉和重要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创造出重要机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母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活水源头，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注入了持久发展的动力。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懈努力的今天，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部中国史室副主任）

匠心

窗花出彩人风流

王锦强 高晗

河北蔚县是中国北方剪纸重镇，单墩村则是蔚县著名的剪纸村。当地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作和传承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贴窗花在村里尤为普及。

剪纸艺人高佃亮与剪纸的缘分自6岁便开始。彼时，剪纸还是人们口中的“窗花”，因为逢年过节会将彩色剪纸贴在纸窗上。高佃亮起初凭剪纸闯世界，是为生计所迫。那时村里是大集体，父母种地挣工分，家里不富裕，而外出卖剪纸和流动传艺，“一年下来能挣上一二百元。当时城里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才30多元”，高佃亮说。

从步行到各村卖剪纸，到后来骑自行车去更远的地方卖窗花，高佃亮一直在探索剪纸的销量与出路。上世纪80年代，一些剪纸手艺人纷纷将剪纸作为生财之道，高佃亮也在自家院里建起剪纸作坊，一家人一起做剪纸。1984年，高佃亮与兄长高佃新建起了全县第一个个体剪纸厂——蔚县单墩亮星剪纸厂。

“刻窗花”是门手艺活，在当地向来不传外人。而高佃亮是第一个把剪纸技艺无条件传授给前来拜师学艺的人。村里一些贫困家庭无力支持孩子上学，为谋一技之长，前来拜师学艺，高佃亮都倾囊相授。多年以后，从他门下学成的弟子，许多成为手艺精湛的剪纸艺人，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高佃亮不仅是传授手艺的第一人，更是将蔚县剪纸从农村带到城市、从国内带到国外的第一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贴窗花的习俗也曾渐渐式微，剪纸零售的路子也越来越窄。为了拓宽销路，高佃亮背上剪纸和刻刀直奔北京。上世纪90年代初，



高佃亮与剪纸（网络图片）

高佃亮买了一辆摩托车骑回家后，全村里的人都为之兴奋，老人们无不竖起大拇指夸赞。村子里的孩子们都到单墩亮星剪纸厂去学艺、挣钱，先后三里五村的人家也纷纷派自己家的孩子去学手艺，有的学成后开厂授徒，还有许多成为经销商，在张家口、大同、广灵一带非常活跃。

民间艺术对乡村振兴具有极大的助推力。剪纸的传承和发展给单墩村带来了许多新变化，新建农家院落占地上百亩地，新村建有文化休闲广场，村里300来户人家大部分早已脱贫致富。近年来，单墩村每年接待大批游客，乡村观光和民俗文化旅游曙光初现。民间文化滋养和维系了单墩村乡土社会的互助关系和淳朴民风，并在一代代能人的锐意进取中提升了乡村文明建设的精神品格。

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出炉

赵晓霞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扁壶朱书陶文（网络图片）

全国十大考古评选活动办公室日前公布了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等得票排名前26的项目入围2017年度终评。据介绍，本年度入围项目具有如下特点：

从地域分布来看，入围的26项考古发现来自18个省和自治区，地域分

布比较均匀。从年代分布来看，史前考古占比最高，有9项入围，夏商周考古有6项，秦汉考古有3项，宋元明考古有8项入围。史前考古与宋元明考古，一高一低，占据入围项目的前两位。

从遗址类型来看，以居址、墓葬和城址为主，但也不乏特色。近年来屡有洞穴遗址考古项目入围，此次更是有3项上榜，反映了洞穴遗址以其地层堆积延续时间长、比较好地保留史前人类的栖居遗迹等特色成为考古研究的热点。另如江西鹰潭龙虎山太上清宫官遗址为大型道教官观遗址，吉林安图宝城城址揭露出一处金代皇家长白山神庙遗址，而重庆奉节南宋白帝城遗址以其依山而建的防御体系颇具特色。

从发掘工作性质来看，主动发掘项目占绝大多数，工作延续时间普遍较长，例如福建明溪南山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均为延续数年的考古发掘和调查项目，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工作更是持续了10余年。

据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将于2018年4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

图说



苗族银匠“锻造”致富新路

今年52岁的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岗略村塘龙寨苗族工匠吴水根，从事苗族银饰加工30余年。其加工的银饰造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2012年，吴水根被评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银饰锻制技艺（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图为3月2日，吴水根在院子制作银帽。（王炳真摄（人民图片））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在20世纪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20世纪以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从思想上的舶来品成功转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实践，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在多个层面上可以互通互释：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世界的图景如出一辙，共产主义道德与儒家“君子”的操守修养可以相提并论，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士大夫的家国天下情怀完美对接。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入人心的“均贫富、等贵贱”“民为贵、君为轻”等政治主张也与“平等”“民主”的价值目标若合符节。这些价

值理念的对接，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能够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都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但要与中国20世纪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也要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写道：“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